

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”这段话行文风趣，但决非反语讽刺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鲁迅对寿先生确是很敬重的：有一次，鲁迅在三味书屋迟到了，先生说了他几句，他就在书桌角上刻了个“早”字，时时勉励警惕自己，从此不再迟到。一八九八年，当鲁迅已不再上学，在家自习诗文时，还请寿先生父子批改；一九〇〇年，鲁迅去寿先生处拜年（见周遐寿：《旧日记里的鲁迅》）；一九〇六年六月，鲁迅从日本回国，在家仅停留四日，也曾探视寿先生，“畅谈国家大事，共同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出感慨。”（见《鲁迅年谱》）《鲁迅日记》载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日、五日赠吊寿师母。一九二三年一、二月间，与寿先生还有书信往来。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，尚与许寿裳在信中谈及“寿老”。鲁迅与寿先生的儿子寿洙邻的过往甚密，这也是与对寿先生的尊重有关的吧！

综上所述，鲁迅对寿先生是敬重的，肯定了他的方正、质朴、博学，以及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等；也善意地批评和嘲讽了先生的迂腐、古板和某种程度上的师道尊严。整个形象给人一种亲切之感。鲁迅笔下的寿先生，虽是三味书屋的主持者，但只是封建教育的不自觉的传播者，而不是自觉的维护者。鲁迅通过自己幼年生活的回忆，把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教育制度，同时针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读经逆流以及厦门大学的尊孔派，进行了现实的战斗，对寿先生是谈不上什么“揭露”和“鞭挞”的。

关于《故乡》中的“希望”

文天行

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：“我想到希望，忽然害怕起来了。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，我还暗地里笑他，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，什么时候都不忘却。现在我所谓希望，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？只是他的愿望切近，我的愿望茫远罢了。”贾放、周东泉二同志在《关于〈故乡〉中的“希望”》（载一九七八年第一期《陕西教育》）一文中说：“作者对‘手制的偶像’丝毫没有肯定的意思。”我以为这个分析太绝对和片面了。“手制的偶像”就是“我”的“希望”，或者说理想。丝毫不肯定“手制的偶像”，就是否定“我”的“希望”、理想。为什么丝毫不能肯定呢？贾、周二同志认为：“把《故乡》中的‘我’讲成有‘远大的崇高的理想’，‘对新社会的理想也是衷心崇敬，抱有无限忠诚的信念’，是与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有距离的。”有“希望”与作者当时的思想有距离，无“希望”就没距离了？可这又不符合鲁迅的实际。五四时期，鲁迅是充满着“希望”的。他说：“人类总有一种理想，一种希望。”（《坟·我之节烈观》）“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。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当然，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对“希望”的看法是有差别的。五四时期，他遵奉“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〈自选集〉自序》），向旧制度猛攻，追求好的社会。他歌颂十月革命，说是“新世纪的曙光”（《热风·随感录五十九‘圣武’》）。他还把“希望”通过自己的小说表现出来。《一件小事》赞扬了

车夫，赞扬了工人阶级。作品中的“我”被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深深感动了：“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”。《故乡》也有类似的情景：“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，又大家隔膜起来……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，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，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，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。”结尾，作者又敞开了对“希望”的描绘：“我在朦胧中，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，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：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

《故乡》中的“希望”，正是五四时期鲁迅“希望”的反映，怎么能说“与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有距离”？“希望”，无可怀疑是有的；但当时的“希望”，是否就是指的苏维埃政权？并不。鲁迅说：“十月革命后，我才知道这‘新的’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，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，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，并且怀疑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·答国际文学社问》）不过，这并不排除在鲁迅的“希望”中有劳农专政的影子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在鲁迅身上，“希望”总是有的，对“手制的偶像”并没持否定态度。

贾、周二同志说：“《故乡》中的‘我’，想到自己对‘将来’怀着种种‘希望’，而对‘现在’却又别无良策，所以十分害怕自己可能会陷入‘随顺现在’的境界。”按贾、周二同志的理解，“随顺现在”就是像闰土那样过日子；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，所以要推倒“手制的偶像”。这样的议论也缺乏说服力。“无良策”，害怕像闰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为什么一定要否定“希望”？难道一否定“希望”，就万事大吉了吗？“无良策”，是说还没找到好的通往“希望”的途径，并不能说明一定不要“希望”。害怕像闰土，正说明自己担心，并非一定不要“希望”。其实，担心害怕正是对“希望”倾心的表现，如认为“希望”可有可无的话，就不必担心害怕了。看来，“希望”与害怕之间的关系，应该是这样：“我”想到自己和闰土都有“偶像”，担心“自己手制的偶像”也与闰土的“偶像”一样，根本实现不了，所以害怕起来。其中，并没有因害怕就要否定“希望”的意思。

《捕蛇者说》中的两条注释

冯 达 人

前人对翻译的文章提出了“信、达、雅”三点要求。所谓“信”，就是译文要准确，忠于原意；“达”就是通顺，没有语病；“雅”就是精炼，生动，优美。这些要求自然也适用于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。

最近，在讲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（见“四川省中学试用课本《语文》第八册”）时，见教材注释中有两条似不符合上述要求，现照抄于后：